

周天勇/著

我们应当用科学的、经济学的方法，现实地分析我们遇到的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正确而务实地制定各地区和各部门大体上可行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把我们宏伟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使人民群众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和幸福。



走出决策的经济学误区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

广东经济出版社

周天勇/著

走出决策的经济学误区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决策的经济学误区/周天勇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2.12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

ISBN 7-80677-331-2

I. 走… II. 周… III. 地区经济-经济决策-研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919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公司
印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 88 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2 插页
字数	240 000 字
版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
印数	1~10 000 册
书号	ISBN 7-80677-331-2 / F·776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读者热线: 发行部 [020] 83794694 83790316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合群一马路 111 号省图批 107 号)

网址: www.sun-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
编辑委员会

主编：茅于軾

编委：盛 洪 陈彩虹 樊 纲
张曙光 张宇燕 汪丁丁

作者简介

周天勇，祖籍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1958 年生于青海省民和县，经济学博士，教授，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年鉴》副总编，中国财经网顾问；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咨询专家，国家经贸委大型企业集团提高核心竞争力专家，云南昭通市政府顾问，内蒙锡林郭勒盟政府顾问等。

1980 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系，1984 年毕业留校，1989 年考取东北财经大学汪祥春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 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 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

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金融风险、城市经济、农业经济等。出版有《劳动与经济增长》、《效率与供给经济学》、《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新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等专著和教材。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中国特殊的低效率通货膨胀”、“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思路”、“改革面临重大转折：从国家借贷经济转向社会资本经济”、

“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总需求不足的深层梗阻及其扩张途径”、“债转股的流程机理和运行风险”、“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学思考”等。

就宏观经济形势、国有企业与银行间债务重组、金融风险、扩大总需求、发展中小企业、扩大就业、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写过一系列内参，报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其中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务重组、发展中小企业解决就业、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发展民营经济、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推进城市化等方面的许多建议得到中央有关领导批示，并批转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决策参考。

为国家经贸委、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国家烟草专卖局、华中电力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外运代理集团公司、云南省昭通市、青海省格尔木市等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和地区作过银企债务重组、烟草税制改革、公司激励与约束机制、大型企业集团提高核心竞争力外部体制环境、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等课题。

总 序

贫困一直是困扰世界的大问题。过去两三百年内，原来是穷国的，现在多半仍是穷国；原来是富国的，现在多半仍是富国，穷富之间似乎有一条跨越不了的鸿沟。但这一难堪的局面，开始出现了转机。首先是因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增长，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内，在 12 亿人口的大范围内，实现了平均约 9% 的年经济增长率，从而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四倍以上，并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

这个伟大的转变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既有国家政策改变所引导的规范变化，也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我们希望这个增长的势头还能再继续几十年。因此要求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收集并出版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

事实上，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非常巨大的潜力。我们可看到社会上存在着惊人的浪费，许多可以开发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做，更不用说农村的几亿剩余劳动力；假冒伪劣产品每年都造成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许多人创造了财富却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另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得到超额的分配，从而大大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经济诉讼案件呈指数规律上升，占用了大量劳动用于非生产性的而且是彼此抵消的活

动；资金未能流动到最能创利的项目，反而去支持重复建设和无效建设；个人之间、集体之间合作的机会没有利用，有时反而造成了种种纠纷，更不用说损人不利己的名目繁多的管制和干预。谁能改变这一现象？是百姓们自己。有些现象与政府政策有关，但制定政策的人也是百姓中的一员。要改变上述种种不合理的现象，需要普及经济学知识，这一套随笔集，正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希望大家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提出的各种建议，做的各种分析，发表的评论和意见。

经济学的知识能否帮助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学家的工作只是为了说明世界，还是兼有改造世界的责任，历来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然而，即使是持否定看法的经济学家也多半对政策分析有兴趣。只有那些经院派的“经济学家”，才把劳动创造价值的论证和捍卫一个学说的纯洁性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的知识确实是远离我们的经济生活，政策出了天大的偏差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关心现实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又表示对经济学能否帮助经济发展表示怀疑，这是出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种敬畏。因为现实的经济实在太复杂了，凭着有限的经济学知识就企图改造这个世界，往往会闹出许多大乱子，所以还不如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承认经济学的能力有限较为妥当。可以说，这是一切抱自由主义信仰的经济学家的共同态度。

经济学究竟能不能帮助经济增长？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前的 3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因为对宏观经济的无知才出台了許多南辕北辙的措施，使得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现在有了凯恩斯理论，政府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对付萧条。可以把握地说，类似的错误不可能再次发生。这难道不是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吗？从微观上看，税制设计、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环境保护条例的选择、公共服务的定价原则等无一不要用到经济学的理论。对普通百姓，虽然他们并不参

与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制定，但他们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懂得政策和不懂得政策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关于产品质量、市场规则、竞争的参与等，都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时每刻的活动。普及经济学知识将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将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深信，随笔集中任何一个建议如果能被接纳的话，它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十亿元，所以这是大大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件事。是为序。

茅于軾

1998年11月16日于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一本写给经济决策者们的书

樊 纲

摆在我面前的是周天勇博士的书稿——《走出决策的经济学误区》。书中以大量经济生活中决策的案例来进行经济学的分析，深入浅出，剖析了下一个乡镇的扶贫，上到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等决策方面可能发生的失误，并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正确合理的思考和决策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实际是写给中国各级、各部门官员的一本书，非常值得官员们一看，也值得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和学习经济学的读者们一看。

国家的经济管理和调节，从乡镇一级领导，到地市县两级领导，再到省部级领导，直至国家领导人，从县里的各局委办科局长，到地市的局委办局处长，再到省区直辖市的局厅委办厅局长，上到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部委办部长，每天都碰到需要决策的问题。从经济学方面讲，决策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经济规律，也有风险、成本、效率等方面的问题。而有的经济案例，从当时的政治、行政、形势需要、人们通常的看法等角度所做的决策选择，不一定符合经济规律，不一定是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也可能充满了风险。如同作者所说的一样，决策可能发生失误，但这并不是有意失误，而是缺乏用经济学的方式来思考产生的失误。我们的经济发展，确实需要决策走出这种经济学的盲区。

最近，乔治·梅森大学的史密斯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经济学上的突破性进展就是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学的实验方法，设定了一些经济学研究实验的标准，用实验的办法来验证经济学假设的合理性。任何一项决策，或多或少包含着决策者对面临问题和解决问题思路的判断和假定。经济活动作为人的社会活动，与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现象不一样的是，它无法进行实验。史密斯的经济学进展对社会体制模式等大的方面选择的经济学假设，提供了一种实验论证其合理性的方法。但是，对于每时每刻大量发生的要决策解决的经济问题，不可能都用先实验的办法来判断对与错，然后再进行决策。如果是那样，需要很多的经济学家，需要很多成本高昂的先期实验，那样做是不经济的。

但是实际上，经济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经济学实验的历史。经济学家们要将成功的案例和失败的案例，与经济学的理论相对照，有的是人们的选择和决策错了，需要按照经济学合理的假设去修正；有的是实践对了，而人们过去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这就需要以纪载的案例来修正错误的经济学假设。人为的实验成本太高，但是人们在自觉和不自觉当中做出的事情，却成为后人的实例，可以用来做为理论的依据。

周天勇博士的这本著作，就是纪载案例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一本书，并且剖析的是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些重大案例。比如，对“村村通”、“城乡一体化”、“乡村工业化”、“农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农业规模经营要回到集体经济体制上”等等这样似是而非的一些有误的思路和决策成本很高的案例给了经济学上的证伪；包括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调整战略的选择、增加就业的思路、扶贫的方式等等重大现实问题。在每一个案例中，作者虽然没有用复杂的模型，没有用大段和长篇难懂的经济学术语，来分析案例，但是在主要是随笔式的文字中，包含了很深的经济学道理。

经济学的研究，既要构建完美的理论体系，给以逻辑合理的证明，又要针对现实问题，分析决策的合理性，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建议。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的经济学，需要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生活很熟悉。周天勇博士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后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任教，在多年的教学、讨论、调查、研究中，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和建设中各级决策层的动向和实践，感知和了解了中国官员决策中的许多现实的热点和难点经济问题，积累了许多案例，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这本书，就是一本为经济决策者们提供理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著作。

中国的经济发展，更需要的是能为经济决策服务的经济学。周天勇博士这本书的出版，必定会对决策和案例经济学的进展起推动作用。我期盼着这本书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2002年10月18日于北京

写在前面的话

我在中共中央党校中青班、地厅级进修班和省部级班从事了许多年“经济发展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等课程的教学，也共同参加了学员们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一些问题的讨论、交流和答疑等；在教学的同时，到许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与一些地方领导和干部进行座谈；也看过许多中央各部门和地方领导的讲话、文件、工作报告、战略规划等。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看到许多发展成功的景象，也看到项目失败和工作失误的情况。我在多年的教学研究和与领导干部们交流的过程中觉得，他们有一股将工作干好的热情，有丰富的工作和管理经验，有政治上的成熟，有很多领导熟悉经济学各方面的知识，也有许多领导倾听专家的意见，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在领导中国经济建设事业中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当然，也有少部分同志过于信赖自己的经验和感觉，自己没有深思和与专家等进行广泛的讨论而决断，发生了一些决策上的失误，这不是他们有意造成的，原因在于对经济学知识了解不深。

特别是在中央党校教学和研究的几年中，东部、中部、西部的干部，各个部门的干部，从事不同职业的干部，县处、地厅、省部级干部，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行业、不同层次，提出了许多有关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我这本书，

就是对一些问题和案例进行经济学解剖，或者对一些认识和政策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反思，写出来给各级领导和官员们认识问题和进行决策时参考的。当然，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许需要商榷，但是总是可以给领导们一种逆向思维的视角，把问题考虑得全面一些，周到一些，以便提高决策的科学程度。

中国在 21 世纪前半叶的发展目标是，第一个 10 年实现 GDP 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再经过 10 年的努力，到 2020 年时，使国民经济发展更快，使人民生活达到世界中下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 2050 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现代化强国。我国在未来的 15~20 年中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除了中央的英明决策和战略部署外，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各级官员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正确决策和实施正确的政策，将是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

过去经济学上一些定性的、价值判断色彩较浓的思维模式、观点和方法，在帮助官员们分析现代复杂的实际经济运行和发展上面有一定的局限性。问题在于传统经济学总是在所谓的“定性”问题上争论不休，而不知道中国实际的经济是怎样运转的，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怎样转换的，中国在她的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障碍，有的一些什么样的招数。中国迫切需要的是研究经济运行的经济学，而不太需要研究价值判断的经济学。

小平同志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从喜欢不喜欢、好还是恶出发，而是从长不长粮食出发，从发展生产力着眼，提出了一些“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再简单和再通俗不过的说法。可是这种务实的道理管用，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可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使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了 20 多年。

一国政府的经济管理，经常会有“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样

的情况。但是，这些国外学者的许多建议或者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或者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有的甚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比如，中国的计划经济和一统天下的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就是从苏联引进的。再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可以不走国外向城市集中的工业化道路，不要发展大中城市，人口不要向城市集中，要在乡村发展工业。国内有的著名的社会学家也相应提出“离土不离乡，乡村工业化”。虽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中国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就目前来看，因为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得过慢而造成的乡村过剩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太多、农业生产不能规模经营，乡村工业的规模不经济、外部不经济，分散的污染无法有效治理，技术进步慢、结构调整难等等，成为农业和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难题。还比如，1995 年时，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提出，中国下个世纪将面临粮食危机，于是国内一些学者也相应提出种种政策建议，农民不能离开土地太多，耕地不能用来建设城市和企业，大家都去安心地种粮食，中国的粮食就够吃了。照这些建议决策和行事，不出几年，中国将面临更大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剧烈动荡的灾难。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国外所有的学者对中国提的意见都是没有用的。许多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和开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中肯的意见，给了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制定经济政策的部门以许多启发。但是，中国的问题，还是中国人最熟悉，还是需要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还是中国人在解决的过程中知道怎样进行调整和协调，使问题解决的过程成本最小和时间最短，并且过程的波动风险最小。

学习西方经济学要结合中国的经济运行、发展和改革实践。现代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它研究实际的资源配置、经济运行、要素投入和贡

献、增长速度、结构转换、制度变迁等等，比起纯粹的定性经济学、价值判断经济学来讲，它要有用得多。用它研究问题，起码会增加财富和粮食，降低成本，减少浪费。但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模式、定理、推断等等，有它许多设定和暗含的假设条件，用它来研究问题，需要注意本国国情所固有的条件。比如，对近几年总需求萎缩，有的学者就简单认为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所致，要单纯扩大财政支出，实行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实际上，中国这次总需求萎缩，有它深刻的体制背景：国有和集体企业重组使产出增加，减人增效改革使职工下岗和消费需求收缩；银行间接融资渠道对国有和集体企业放款的收紧，长期对个人和私营企业的限制，民间投资渠道又不发育，加上近期上市公司一资本市场融资渠道遭重创，结果使储蓄转化为投资需求的总渠道不畅。这些，与西方经济学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暗含的民间投资、上市公司一资本市场、银行贷款等渠道畅通等假设条件，只是由于企业家信心不足、消费者不愿意消费等原因，由国家一实行财政政策，立即就可以恢复经济运行的均衡，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不积极扩张民间投资渠道，光是用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难道将大部分储蓄都由财政渠道转化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扶贫帮困等社会保障消费需求不成？这种政策的结果将不会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经济学上看，储蓄大于投资，会形成生产过剩、就业不足、物价低迷等局面，但是为什么会形成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可能在不同的体制条件、不同国度里，其原因是不同的。因此，要下的药方也是不同的。只知道西方经济学，而不知道中国暗含的许多深层次问题的学者们，可能也无法用西方经济学之药治中国经济问题之病。

然而，这并不是说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没有用。用处是相当大的。有些政治家认为，经济学在治国、治一行业、治一地方中用处不大，只要有行政管理知识，只要有经验就可以了。

这是大错而特错。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政治家都是经济学家，但是治理现代国家、行业和地区，他必须懂得经济学的ABC，他起码要让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们去分析和判断，最后他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决策。经济是一切社会、政治等生活的基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和繁荣，首先需要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比如，管理金融工作的，起码要知道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才不能在物价负增长的时候，作出收缩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的错误决定来。再比如，一个地区的领导，在失业的人口太多的情况下，还是热衷于发展减少就业的高技术行业和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大工业企业，还在这方面优化所谓的结构，这就说明他不懂得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大中小企业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经济学关系。他不知道仅仅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大工业企业，会造成就业不足和社会不稳定危机。还比如，广东一个县级市，外来人口占本地人口的60%，大量的社会治安问题发生在这些群体中，于是市领导和综合部门制定的发展战略中，要将外来人口在未来15年中，从60%减少到25%。如果该市真是这样做，别的相邻的市县不同样减少外来人口，该市的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的加工工业将受到重大的打击。因为外来便宜的劳动力，是其加工工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最主要原因。他不知道他这个地区的繁荣来自于外来劳动力成本便宜这样一种比较优势。

学术上研究经济和社会繁荣，不光是给人们展示一个美好的未来，更重要的是给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者们分析繁荣到底会来自哪里。比如，中国未来15年中的繁荣主要会来自哪里：会来自高科技吗？会来自农业的发展吗？会来自发展小城镇吗？会来自结构优化和调整吗？还是会来自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自劳动密集性的企业，来自制造业，来自大中城市的建设，来自城市化水平的提高？